



外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研究丛书

主编 / 李剑鸣



日本政治民主化进程 研究

王振锁 等著



上海三联书店



外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丛书

主编 李剑鸣

日本政治民主化进程 研究

王振锁 等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王振锁等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 9

(外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丛书/李剑鸣主编)

ISBN 978-7-5426-3647-8

I. ①日… II. ①王… III. ①民主-政治制度史-研究-日本 IV. ①D7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2063 号

日本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

丛书主编 / 李剑鸣

编 者 / 王振锁等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24175963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80 千字

印 张 / 27.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647-8/C·395

定 价 / 56.00 元

出版说明

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南开大学设立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进入了全国高校一百个重点研究基地之列,并启动了每年一度的重大课题评审工作。我们申报的“世界近现代史上的政治民主化问题”成为第一批入选的课题。在批准立项以后,课题组成员分头行动,开始了具体的研究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产生了一批阶段性成果。2006年5月,在南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的支持下,课题组在天津召开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研讨会,除课题组成员外,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多位知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并提交了论文。这次会议既是对课题组工作的阶段性小结,也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会后,课题组成员再接再厉,又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预定的研究任务,最终的成果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几本小书。

政治民主化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以往我们考察现代世界的形成和演变,比较注重经济的层面,重点讨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的作用,通过阐释这些历史要素的作用,来展现地球上相对孤立隔绝的各个地区和人群,如何逐渐形成相互的联系,如何在交往、冲突和融合中塑造出一个愈益具有整体性的世界。除此之外,现代世界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在人口构成、文化传统和经济水平方面差异纷繁的众多民族国家,自18世纪末期以来纷纷采用了某种形式的“民主”,作为国家构建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因此,考察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传播、流变及其影响,考察不同国家和文化传统中

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可能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及其特征。

对于这样一个大题目,我们显然难以面面俱到,而只是选取了某些点来加以探讨。丛书的作者以课题组成员为主,也包括不少相关领域的学者。我们采用历史学的视野和方法,力图对世界历史中的“民主之旅”做一个梗概性的梳理,并对欧洲、北美、拉美、亚洲和中东某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历程,做一点比较具体而深入的讨论。政治民主化所涉及国家和地区,无疑是相当广泛的,我们选取这些点来讨论,主要是依据作者的学术专长。至于许多没有涉及的地区和问题,只有留待今后的努力。同时我们也相信,国内史学同行一定会不断推出新的论著,逐步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李剑鸣

2009年1月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世界近现代史上的政治民主化问题》（项目批准号 04JJD770001）的成果之一

本书由（“985 工程”二期项目）
“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出版

目 录

导言 日本政治民主化进程述要 / 1

上 编 / 13

- 第一章 明治时期的政治改革 / 15
- 第二章 自由民权运动 / 45
- 第三章 大正德谟克拉西与民本主义 / 68
- 第四章 战前政党政治的兴衰 / 92
- 第五章 战前的政治民主与民族主义 / 108

中 编 / 135

- 第六章 战后初期的政治民主化改革 / 137
- 第七章 “五五年体制”与政治民主化 / 156
- 第八章 战后日本的官僚制民主化 / 186
- 第九章 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与政治民主化 / 220
- 第十章 战后社会运动与政治民主化 / 251
- 第十一章 战后政治民主与新国家主义 / 272

下 编 / 303

- 第十二章 宪法与日本的政治民主化 / 305
- 第十三章 天皇制与政治民主化 / 326
- 第十四章 日本国会选举制度的演进 / 356
- 第十五章 国会改革与政治民主化 / 387
- 第十六章 政治文化与政治民主化 / 411

后记 / 427

导言 日本政治民主化进程述要

日本的历史若从弥生时代算起,也历经了两千余年,其间主要是漫长的封建社会,明治维新以后才进入近现代社会,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也就是日本的近现代历史。

明治维新至今已有 140 余年,其间虽历经多次反复与曲折,但总的趋势是从一个幕藩割据的封建社会走向现代民主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加速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其后多年来,虽然日本基本上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但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迄今日本仍是亚洲最健全、最稳定的现代民主制国家。

纵观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道路是曲折的,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更具有“日本特色”。对其民主化进程的方方面面,作一番专题性的梳理和研究,显然是有益的。

一 近代以来日本政治民主化的演进历程

(一) 从幕藩体制到明治宪法体制

幕藩体制是德川幕府建立之后的基本统治方式,在整个江户时代,德川家的世袭将军是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为防止幕藩体制的瓦解,德川幕府先后实行了三次幕政改革,即“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和“天保改革”。这三次改革,除享保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外,宽政、天保两次改革均未成功。此外,幕府末期的多次农民起义也从根本上打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基础。

在对外关系方面,德川幕府的基本政策是“锁国”,美国以武力迫使日本开国,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使日本走出了开国的第一步。随后,英、俄、荷等国援引美国先例,陆续胁迫幕府签订了类似的“亲善条约”,这意味着延续 200 余年的幕府的锁国体制彻底崩溃。

在当时的各种政治思潮中,“尊王攘夷论”逐渐在幕末政治潮流中居于主流地位,成为推翻幕府政权的重要思想武器。为了维护幕府统治和对抗尊王攘夷运动,幕府采取了“公武合体”政策,试图协调幕府与朝廷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们积极推进朝廷与幕府之间的政治联姻,

在西南强藩中长州藩、萨摩藩相继借公武合体运动进入中央政界。以萨长两藩为核心的倒幕势力,高举“大政奉还”的旗帜,发动了“王政复古”政变,并最终通过戊辰战争消灭了幕府势力。戊辰战争的终结,标志着德川幕府的彻底灭亡和明治新政府的最后胜利。

明治时代的前半期,是日本由封建幕藩体制国家向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过渡期。明治初期,在日本国内形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以巩固政权基础并建设近代国家。《五条誓文》表现出建设近代国家的积极精神。新政府公布《政体书》,实行太政官体制,此后,太政官体制随着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又历经数次调整。

“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在日本的近代化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它彻底消除了封建领主的分散割据状态,完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第二,它保障了改革措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加速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化进程。“秩禄处分”与“土族授产”则是新政府进行的封建等级身份制度的改革。

为了摆脱落后地位,明治政府在改造封建国家旧体制的同时,积极推进国家的近代化建设,提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

“征韩论”问题是明治政府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政府内部围绕着“征韩论”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

的实质是反映了政府内部保守派与急进派在今后施政指导方针上的论争,即“内主外从”还是“外主内从”。该问题如何发展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存在。

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以开设国会、颁布宪法为主要目标,宣传“自由”、“民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君主立宪体制的确立。

《大日本帝国宪法》,通称“明治宪法”。明治宪法在日本政治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亚洲各国中,明治宪法是第一部宪法,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它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制的延续和发展,其本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特权财阀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实行寡头专制。

明治宪法的最大特点是“天皇中心主义”,其最大弊端也在于“天皇中心主义”,尤其是“天皇统率陆海军”和“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的规定,使得军权独立于国家行政权力系统之外,军权对施政权的干预度,使它时时处在政权的“监护人”与“接管者”的地位,给国家政治生活蒙上了浓重的军国主义阴影,最终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一体制本身所孕育的特殊权力,反过来成为体制的掘墓人。

(二) 走向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体制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大力充实军备,耀国威于海外”的方针,随后逐步确立了向中国和朝鲜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

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政权对中国所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资本主义由此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员参与瓜分世界,直至发动了日俄战争。以日俄战争为转折点,战后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方面,通过战争掠夺了广大的海外市场,成为殖民帝国;一方面,在国内各部门普遍形成了资本主义产业的垄断组织,这表明日本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其他帝国主义相比,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既具军事性、又具封建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这次大战中,日本帝国一跃变成世界五强之一。日本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加紧侵华,以缓解国内矛盾。大隈内阁与袁世凯签署了有名的“二十一条”。在此前后,日本又制造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日本一批法西斯分子发起了一个“国家改造”运动。在日本陆军和海军内部,都出现了国家改造运动的核心人物和组织。右翼团体也与军部相互呼应,投入到国家改造运动中。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贯彻实施这项侵略方案的必然结果,这表明天皇法西斯专政已基本形成。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国内建立了战争体制。近卫文麿内阁开展法西斯总动员运动,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决心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所谓近卫新体制,就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统治体制。新体制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式的法西斯独裁体制的建立。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条内阁建立的大政翼赞体制,把日本纳入自上而下的统一的法西斯统治系统。

(三) 美国占领与政治民主化改革

日本战败投降后,实际上由美国单独占领,“盟总”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日本国民的绝对统治者。美国政府公布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在日本推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政策。

美国占领当局实施了一系列民主化政策,促使日本的旧统治体制迅速解体。主要包括:解除日军武装,保障思想、宗教、言论、集会的自由;废除治安维持法等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法律、敕令及法规;释放政治犯;废除秘密警察及一切言论统制机构;罢免内务大臣、警视总监、特高警察等官吏。相继废除国防保安法、军机保护法、言论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治安维持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治安警察法等。这标志着天皇制国家的治安机构解体,向民主化

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随后,麦克阿瑟下达了“五大改革”指令,承认妇女参政权,修改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着手制定《工会法》,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实行国家与神道分离,冻结皇室财产,解散超国家主义团体等。还有解散财阀、解除公职、农地改革以及修改宪法等重大改革指令。美国主导下的战后改革,对战后日本的发展道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本国宪法》的制定,对日本战后政治民主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新宪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了天皇制和议会制度;改革了内阁制度和司法制度,将中央集权制改为地方自治制度;以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为原则,详细规定了国民的权利与义务;明确规定了放弃战争的条款等。新宪法从国民主权主义、和平主义、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理出发,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理论体系,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宪法,从而在日本首次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宪法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确立了“象征天皇制”,一是放弃战争和非军事化。

盟总向日本政府下达的《关于解除不适宜从事公务者公职之备忘录》和《关于废除政党、政治结社、协会及其他团体之备忘录》,即“解除公职令”,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日本战后改革中占有重要一页,对日本战后政党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 五五年体制与自民党一党优位制

1955 年左右社会党统一,自由、民主两大保守党合并为自民党,确立了保守党执政、革新党在野的“五五年体制”,也就是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制”,从此,开始了长达 38 年的自民党长期政权,岸信介内阁推行“政治主义”,对革新政党和人民群众运动采取强硬姿态,试图改革宪法,完成了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历史使命,借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由于新安保条约增强了日美军事同盟的危险性,所以导致日本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安保斗争。

1960 年代以后,自民党政权避免重新突出政治主义,而走经

济优先的道路。池田内阁采取“低姿态”政策,提出“宽容与忍耐”的口号,使政府以“中庸”面孔示人。池田的经济优先政策主要体现为对内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外实行进口贸易自由化政策,日本经济出现持续高速增长。

佐藤长期政权继承了池田内阁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是自民党政权的黄金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佐藤之所以能长期执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时代的恩惠与机遇。

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的10余年间,是自民党政权动荡的10年,其间的五届内阁平均执政2年,发生了田中内阁因“金权政治”败露而下台,大平正芳与福田赳夫之间的“大福之争”,大平内阁时期的“四十天抗争”等重大政治事件,自民党政权面临着重大政治改革。

在“保革伯仲”的有利形势下,各在野党开始探讨成立联合政权的可能性。但围绕联合政权构想,在野党意见不一,各行其是,这不但帮助自民党得以维持政权,而且也将原来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革新自治体”推向解体。

中曾根内阁提出著名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不但确立了“政治大国”的发展目标、实现了政治转折,而且国内政局发展较为平稳、内阁支持率较高,是自民党一党优位制下的又一个“黄金期”。

但是,1989年以后,日本政坛又陷于动荡。昭和天皇裕仁“驾崩”,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但“平成”时期不太平,内阁更迭频繁,政治改革屡屡受阻,自民党政权出现“末期症状”,而导致执政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政权垮台的宫泽内阁,则担当了终结“五五年体制”的历史角色。

1993年日本政党政治体制所发生的变革,本质上只是新旧保守势力之间的政权易手,新保守政治势力取代了传统保守政治势力,政权的阶级性质没有任何改变,日本政治从“保革对立”进入了“保保竞争”时代。从政党体制的角度看,“五五年体制”的本质是日本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制。“五五年体制”的崩溃,则意味着日本

社会的多元化和一党支配下的民主“变形”。

（五）联合政权与“后自民党时代”

1993年自民党下台后，日本七党一派共同组成了“非自民党”联合政权，从此，日本政局进入了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联合政权时代。

细川内阁通过的“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一般认为是“保守维新”，它推动了日本保守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但有很大的局限性。

村山联合内阁是战后初期片山内阁以来再次组成的以社会党为首的内阁，也是自民党下野10个月后重新执掌政权的开始。严重对立的自民、社会两党联手组建新政权，表明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进一步淡化，权力争夺成为影响政界分化改组的主要因素。

在村山内阁期间，执政的社会党反而一直处于衰退之中，这是因为政党地位的变化迫使执政的社会党不得不大幅度调整该党先前的方针政策，而社会党基本路线的转变，对社会党自身势力的发展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最后社会党也正式更名为无足轻重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

9个在野党派共同创建的“新进党”成为一支唯一能与自民党相抗衡的强大势力。新进党的成立，标志着1990年代初期新党林立的局面暂告结束，并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政界分化改组的进程。但成分复杂的新进党不久解体，这意味着冷战后在日本建立“两大政党制”的进程严重受挫。新进党实际上一分为八，日本政界再度出现小党林立的局面。在野党势力的分散化，使得原本遭到削弱的自民党的执政党地位相对增强。

新成立的民主党以“民主、中道”作为政治理念，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政党。民主党的崛起，反映了日本社会政治发展的倾向，即从中央集权型政治向大众民主政治形态的转变。

小泉内阁以“彻底改革派”姿态出现，对经济、财政、行政、社会政治等领域进行了“没有禁区的改革”，改革力度大，范围广泛。小泉内阁所推行的“结构改革”历程，尽管一波三折，但对日本经济的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小泉首相提出的“改变自民党”的口号和推行的“结构改革”路线,目的是以求重新巩固自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对自民党势力的发展也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小泉的“另类性格”及其所推行的内外政策,也为自民党的形象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小泉后”的自民党政权又呈现政权频频更迭的不安定的扑朔迷离状态。2009年8月,在野的民主党终于击败与公明党联合执政的自民党,登上了政权宝座,“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局面有可能形成,从而进入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 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几个特点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率先完成政治民主化的国家,历经100多年,经过若干曲折和坎坷,日本终于从一个封建社会转化为具有现代文明的法治社会和民主国家,在日本政治民主化演进过程中,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 经历了三次政治民主化高潮。

第一次是自由民权运动。

自由民权运动是明治前期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它主张反对专制政府,要求参政权、开设国会、实施自由民主、制订宪法、减轻地税和修改条约。自由民权运动由上至下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的结果,推动了立宪体制的最终确立。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具有启蒙意义。

第二次是大正德谟克拉西。

大正时期是一个社会激烈动荡、价值观多元化、多种政治思潮竞存、重新探索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历史时期。如果说明治初期“文明开化”思潮是推动日本现代化的精神动力,那末,“民本主义”思潮作为“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灵魂,则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大正时期整体政治思潮中居

于主流地位,很快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的要求也为“二战后”日本民主改革奠定了战前基础。

第三次是“二战”后新宪法下的政治改革。

《日本国宪法》的制定是日本战后政治改革的最重要内容,新宪法标志着日本开始全面实行西方现代民主制,从而在日本首次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根据《日本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日本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其中主要包括议会制度改革、内阁制度改革、地方自治制度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等。

(二) 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凸现着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它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能最大限度地聚合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能量,即具有无限的统合民众的功能。因此,近代历史上,它曾作为面临外压或被压迫的民族的一种意识形态,在抵抗外来侵略而实现民族独立方面,发挥了积极进步的作用。

然而,民族主义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负面价值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牺牲个人权利和自由为前提,这种现象在近代日本尤为严重。明治政府从政治、法律、教育等各个方向,“自上而下”推行反动的官方民族主义,即树立天皇及国家的绝对主义地位,倡导绝对的“忠”“孝”伦理,以此来统合国民,这便是日本近代天皇制极端民族主义诞生的历史土壤。

近代日本通过对外扩张,把民众的能量引向亚洲国家。到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便形成了整个国家规模的反动,其民族主义也发展为它的极端形态——天皇制军国主义。甲午战争既是极端民族主义确立起来的主要标志,也是近代日本走向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开端。以甲午战争为标志,日本近代极端民族主义规定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方向,其破坏性能量最终在 20 世纪显示为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长达十五年的侵略战争,最后以失败而

告终。

日本的战败宣告了极端国家主义的彻底失败。旧体制被摧毁,取而代之以全新的体制,但支撑那个旧体制的思想,却不可能通过一场战争的胜负决定其去留。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纠合到一起,以各种复归旧体制的形式来进行抵制。战后这部分人对新体制的抵制,以及以战前国家主义内容的部分复归,可以视为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出发点。但时过境迁,完全复归战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人改头换面,力求复活旧体制中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那部分内容。

这种以部分改变内容形式但却以复活战前国家主义为显著特征的新国家主义在战后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但是,碍于国内外形势,这股逆流从1960年代开始不得不变为一种蛰伏的潜流。这股逆流重新以新的面目登场是从1980年代以后中曾根政权开始的。

中曾根政权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宣告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已经告一段落,在面向未来,以树立政治大国为目标的层面上,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乃至其后日本人的某种期待和向往。中曾根政权的新国家主义主张,既有政治大国的新主张,也有宣传天皇意识形态、参拜靖国神社等复活战前国家主义意识的某些成分,因而受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使其所谓新国家主义政治大大受挫。

(三) 独特的日本式政治民主化

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国家,具有其自身的若干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外力因素的重要促进作用

(1) 自由民权运动的促进作用

一般地说,颁布宪法、开设国会、举行普选、实行政党内阁制度,是近代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条件,采取了诸如“废藩置县”、“秩禄处分”、“地税改革”等一系列旨在破坏封建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资产阶级性改革措施,然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却没有随即推行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政策。